

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新概括

——学习新编《毛泽东著作选读》

雍 涛

新编本《毛泽东著作选读》是广大干部和青年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的一部好教材。《选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着重编选了毛泽东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科学著作，这些论述不仅集中体现在《实践论》、《矛盾论》等专门的哲学著作中，而且体现在其他许多著作之中。这里主要谈谈1957年以后的重要著作，特别是过去未公开发表过的几篇著作中关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新概括。

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

1957年至1966年是我国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进入全面建设时期以后，毛泽东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问题作了初步探索，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及其处理原则，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后来由于滋长了主观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左”倾错误严重泛滥。1958年底1959年初毛泽东和党中央对这些错误开始有所察觉，并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向广大干部重新提出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问题，论述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民主集中制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关系，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过程论，强调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分析问题，从总结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中说明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所发展。1959年错误地发动了“反右倾”斗争，1982年对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绝对化的论述，1965年又错误地提出了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论点。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政治批判，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作为这一过程在理论上的反映的毛泽东思想，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著作中，一方面有不少光辉的新思想、新观点，继续为毛泽东思想的宝库增添了财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违背他以往奠定并坚持的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原则的错误论断，或者在基本正确的著作中仍带有某些“左”的思想痕迹。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有助于我们在学习毛泽东著作时采取分析态度，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但这里我们主要是谈他的科学著作中

的新思想、新观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贡献。

在初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中概括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首先是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论述。

1941年毛泽东在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时曾经谈过自由与必然的问题。1959年在《党内通信》和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从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中进一步论述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从哲学上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

第一,给自由的含义以科学的规定。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哲学家斯宾诺莎和黑格尔已经提出并论述过“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深刻的命题,但他们都不懂得实践在获得自由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恩格斯指出:自由不仅是对必然的认识,而且是根据这种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世界,使客观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能力。^①很明显,这个论述已经超出了认识范围,强调了“支配”、“服务”的意义,但对自由的科学含义尚未作出明确的概括。毛泽东根据以往中国革命的经验和社会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训,明确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②。这一论断强调了实践在促进必然向自由转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的含义。大家知道,认识事物的必然性是获得自由的前提,但无数事实证明,人们仅仅认识了事物的必然性即客观规律,但不去做工作,不去实践,还不能有自由,只有认识了客观规律,又在实践中学会运用这些规律,达到了改造世界的目的,才有真正的自由。实践是必然向自由转化的动力和源泉。毛泽东的这一概括,为自由的含义增添了新的内容。

第二,指出取得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是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条件。毛泽东指出:“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③又说:“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④这就是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特别是错误、失败的经验是实现必然向自由转化的重要条件。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指出正确的认识、科学的理论是自由的向导和保证。毛泽东指出: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有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图样”,即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但要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而且要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即不但要有总路线、总政策,而且还要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样才能保证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如果对必然性没有正确认识,没有理论准备,又欲充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向导,就必然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碰得头破血流。^⑤

第四,指出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这种无限性不仅表现在人们对于具体事物的认识上,而且表现在人类对于无限发展着的总的宇宙的认识上。毛泽东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⑥又说:“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

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一个发展。

其次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概述。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概述为“实践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说明过认识论与群众路线的关系。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大跃进”的教训，对我们的干部不厌其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并对它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第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群众路线的关系。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方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检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碰钉子的。”1964年他在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简单地讲，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⑧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党的群众路线是统一的，重申了1943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的思想。

第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认识从实践中来，但一般说来，个人的实践和认识是比较狭隘的、片面的，而集体的实践和认识则比较丰富、全面，因而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应当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毛泽东说：“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民主集中制提供理论依据，而民主集中制则为领导机关获得正确的认识 and 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真理有时候不在多数人手里，而在少数人手里。一个认识，一项决策是否正确，不能简单以赞成的人数多少而定，而应以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但由于真理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最终必然为绝大多数人、为广大群众所承认。因此我们要把坚持真理和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辩证地统一起来。

第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两变”的关系。毛泽东认为，“两变”（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1963年他针对许多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状况，明确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⑩“两变”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通俗概括，又把物质和精神、实践和认识这两对认识论中的基本范畴统一起来了。

总之，毛泽东把“实践——认识——实践”、“群众——领导——群众”，“民主——集中——民主”、“物质——精神——物质”这几个公式辩证地统一起来了，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了新的开拓，使之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对唯物辩证法作了新的阐发

首先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论。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出现过否认事物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为了纠正这种倾向，毛泽东着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论。其基本观点如下。

第一，事物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恩格斯曾经指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①1937年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指出，“统一的物质世界是一个发展过程”，要把世界当作过程去考察。《实践论》考察了认识的发展过程，《矛盾论》考察了事物（矛盾）的发展过程。1963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中指出：“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②为什么呢？因为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所谓过程，就是物质运动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和空间上的延伸性。过程论把物质、运动和时空辩证地统一起来。强调事物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本质上就是强调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是辩证法的灵魂。任何否认过程、否认阶段的思想，都是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

第二，任何一个过程无不包括两重性。所谓过程的两重性，就是任何一个过程都是对立的统一，都是一分为二，如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我们的工作既有成绩，又有缺点错误；一个干部既要注重政治又要懂得业务，做到又红又专，如此等等。过程的两重性是由矛盾的两重性决定的。对过程的两重性，毛泽东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过程的有限性和无限性。毛泽东认为，任何一个具体过程都是有始有终的，即有限的，但就过程的发展、推移来说，又是无始无终的，即无限的。

二是过程的常住性和变动性。所谓过程的常住性，是指过程的质的肯定性，此一过程与彼一过程的区别；过程的变动性是指过程质的否定性，此一过程向彼一过程的转化。而常住性是相对的，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三是过程的阶段性和持续性。阶段性是相对的，连续性是绝对的。由此毛泽东提出了根本质变和部分质变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③的原理，即事物在发生根本性质变革之前，处于总的量变过程中，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比较次要的性质或个别部分的性质却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这一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理论基础之一。

上述原理从方法论上告诉我们，对任何事物都要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坚持“一分为二”、坚持“两分法”，反对“铁板一块”和“一刀切”的做法；坚持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既反对思想落后于客观事物发展的右倾思想，又反对企图超越客观事物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所有这些对于纠正“大跃进”期间的“左”倾错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认识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原因，纠正得很不彻底。

其次是进一步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辩证法时，曾经肯定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但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作详细的说明。列宁解决了这一问题。

他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⑭又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⑮1937年毛泽东写的《矛盾论》正是做了这样的“说明和发挥”。它说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并且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为线索展开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方面。《矛盾论》虽然是讲对立统一规律，但实际上已蕴含着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说明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思想。

1938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写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把联系的观点、运动变化的观点、对立面斗争的观点并列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四大特征加以论述，忽视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并且得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不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结论。斯大林的这种观点，长时间内对理论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辩证法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倒退。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多次重申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1965年他在李达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写了一段批注，明确指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⑯

第一，毛泽东认为，量变质变规律就是量与质、量变与质变的对立统一。因为事物的运动表现为两种状态，一是量变状态（相对静止状态），即事物内部矛盾的双方处于相对统一的状态；二是质变状态（显著变动状态），即统一物分解，一事物向他事物转化的状态。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双方互相斗争，引起事物不断地由量变转化为质变。因此事物由量到质和由质到量的转化，是受对立统一规律支配的，离开了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就会是不可理解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它的内容就是事物内部肯定与否定这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及其互相转化。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任何一个肯定的事物，必然在其内部包含和发展着自己的对立面。事物内部肯定与否定这两个对立面的斗争，使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由肯定转化为否定。这就是事物的新陈代谢，即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可见否定之否定规律同样是受对立统一这一根本规律决定的。

第二，毛泽东认为，所谓联系，就是各种对立面之间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关联；所谓发展，就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的结果，离开对立统一规律，联系和发展就无法得到说明。

第三，其他一系列成对范畴，也是客观世界矛盾运动反映到人们头脑中，就产生了各种对立的观念、范畴，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如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等等。这些成对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由对立统一规律决定的，也可以说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补充和发挥。

毛泽东强调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不同意把辩证法的几个规律并列的传统观点，是有其合理性的，是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的，这对于批判形而上学，恢复唯物辩证法的本来面目，对于改造哲学体系，有重要指导意义。

但是毛泽东在上述批注中已经有重视对立统一规律而轻视其他规律的倾向，在其他一些谈话中更是明显表现出来。他说：过去讲辩证法有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我就不相信后两个范畴。我的意思，辩证法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规律，三个并列就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这就是说，毛泽东不承认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把它们看成与其他范畴处于同等的地位，进而把辩证法的全部内容归结为对立统一规律。这样未免失之偏颇。列宁虽然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但又认为

辩证法的内容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其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⑩对立统一规律当然处于核心地位，但其他规律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如果说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那末量变质变规律则揭示了事物发展的状态和道路，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方向、趋势和环节，它们的作用是不能互相代替的。理论上的偏颇，会给实际工作带来危害。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们讲辩证法，只讲对立统一规律，不讲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而讲对立统一规律又往往只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和其他方面的问题，结果丰富多采的辩证法只剩下了干瘪僵死的“分、斗、变”公式，给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生活、文化事业造成很坏的影响。这种倾向我们已经纠正或正在纠正之中。当然，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究竟是一个还是几个，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还是可以讨论、争鸣的。

注释：

①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页；第4卷，第239—240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3、846、486、845、846、844—845、820、840、805、847页。

⑭⑮⑯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240、411页。

• ~~~~~ •

上接第31页

者进入世界市场后上当受骗，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懂国际公共关系学 and 没有利用它来打开国际市场。如果我们有许多专家和职员精通国际公共关系学，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处境就会比现在好得多。

〈3〉 逐步普遍设立公共关系机构。作为一个特殊的高级服务行业的公共关系属于第三产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有近100年的历史，它的大公司大企业都设有公共关系部社会上设有许多跨部门跨企业的独立的公共关系公司。美国是现代公共关系事业发源地，也是当今世界上公共关系行业最发达的国家，它有几千家公共关系公司，从业人员目前已达15万人，他们中的五分之三是大学毕业生，五分之一是研究生。美国公共关系协会（PRSA）是全国公共关系人员的最高级组织，目前拥有会员近万名，还出现国际性的公共关系协会。不仅实业界有公共关系运动，而且政界、宗教、劳动各方面，公共关系运动也很盛行，许多高等院校把公共关系学列为学生的必修课程。美国政府1985年财政年度的公共关系开支超过四亿美元。美国公共关系如此发达，使企业与它的公众之间联系紧密，办事方便，效率高，服务周到，

竞争力强。在我国，公共关系行业属于新兴的行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为了适应改革和横向经济联合的需要，为了更好地开展国内外的公共关系业务活动，必须较快地设立一些公共关系机构，在企业 and 联合体内可设立公共关系部，在社会上可建立公共关系公司、公共关系协会，作为企业、联合体内以及它们与社会、国家以至世界联系的桥梁，成为国家在新经济体制中管理企业、联合体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负责国内外的全部公共关系业务活动。然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渐普及推广。

〈4〉 有批判地引进国外的公共关系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关系学的核心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是资产阶级争权夺利、唯利是图、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利用公共关系学营私舞弊，收买拉拢、贿赂腐蚀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有害的东西是不能引进的。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关系学中对社会主义有益的经营管理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我们必须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因此，对于外国的公共关系学，我们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全盘洋化，必须适合我国的国情，吸收对我国有用的东西，加以消化、创新、并逐步创立社会主义的公共关系学。